

HUNAN WENSHI

湖南文史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46
1992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第
46
辑

湖南文史

周谷城题

湖南文史杂志社

- 顾 问 吴立民 林增平
刘晴波 李 警
- 主 编 田伏隆
- 副 主 编 高 原
- 责任编辑 陈永芳

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6辑

编辑/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主编/田伏隆

副主编/高 原

责任编辑/陈永芳

出版/湖南文史杂志社（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15号）

发行/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

印刷/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

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

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5 字数180,000 印数14000
版次/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长沙第1次印刷

国内统一刊号 CN43-1175/k

定价/3.00元

建国后史料

伟大的历史变革

——我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若干事件的回顾

..... 蒋慎仪 (1)

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建设回忆..... 胡青坡 (26)

确定与恢复土家族民族成份的前前后后..... 田荆贵 (43)

建国后湖南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概况..... 彭肇藩 (72)

往 事 钩 沉

湘西永顺地区剿匪见闻..... 罗善达 (81)

桃源八区事件始末..... 李云飞 罗永常 (90)

三 湘 史 华

湖南的慈幼事业..... 谭俊文 (95)

2A39/10
葬堪告慰故王孙

——纪念谭光先生……………陈秉立 (112)

贵州光复 首义殊功

——张百麟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陈庆华 (119)

湘籍民国将领

周 斓自传……………(132)

宋达将军其人其事……………彭志坚(147)

湘籍文化名人

忠诚的战士 辛勤的园丁

——音乐教育家、作曲家向隅略传 ……………久地 朱萍 (151)

质朴淳厚 浪漫情怀

——艺术家陈白一小传……………李萧星 (167)

海 外 之 窗

湖南大学六年回顾……………李昌来 (177)

历 史 资 料

学者名流致欧阳敏讷信札……………海素芝整理 (204)

伟大的历史变革

——我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若干事件的回顾

蒋 慎 仪*

一、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，正确贯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、限制的政策

我省地处内陆，素以“鱼米之乡”、“有色金属之乡”著称。除盛产稻谷和有色金属外，还有丰富的土特产。据1950年统计，不包括煤、铁、有色金属等矿产品及大宗手工业品的180种土特产品产值，约合当年稻谷产值的91%。沿湘、资、沅、澧四大河流形成的一批中小城镇，都是农副土特产品、矿产品的集散地，而且各具特色。如长沙市与芜湖、九江、无锡并称全国四大米市；湘潭市为我国七大药材集散地之一；邵阳与上海、汉口并称全国三大皮毛市场；常德年购销桐油30——40万担，仅次于四川万县而居全国第二位；洪江为湘西木材、桐油汇集之所；津市为澧水流域棉花的集散地，被誉为“花市”。因此，我省工商业的特点是以商业为重心，土特产为主体，工业比重较少，而且是农林牧副渔等土特产品和矿产品的简单加工，碾米、织染（包括针棉织）、铸锅炼铁、陶瓷、机械

* 蒋慎仪，历任中共长沙市委统战部干部、省委统战部科长、处长、副部长等职，现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
是我省私营工业的主导行业。以长沙市为例，1949年工业仅占21%（铁路除外），商业则占79%。在工业中，公营企业占10%，私营企业占90%；在商业中，私营企业的比重则更大。因此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如何正确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、限制的政策，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，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性，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建国之初，省委、省政府一方面迅即没收官僚资本，组建国营经济机构，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。至1950年初，全省共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在我省经营的银行、贸易、工厂、农林、水利、交通卫生等单位220多个，其中接管没收的工厂28家，各种矿场26个，银行、贸易等单位14个。同时，建立起省级贸易、土产、蛋品、医药、专卖、盐业、茶叶、粮食、花纱布、百货、石油、工业器材等12个国营专业公司，部分专、市、县设立了分支机构，基层设立了采购、批发、零售经营网点。另一方面则是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私营工商业开工复业。

程潜、陈明仁宣布和平起义后的第三天，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、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王首道同志即邀约工商界的刘涵（中华窑业厂长沙办事处负责人）、向德（中华煤气机厂厂长）、曾诚意（长沙利华橡胶厂经理）、袁世先（民生翻砂厂负责人）等7人座谈恢复生产、支援前线问题。9月15日，在长沙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，王首道同志再次宣传党的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，城乡互助，内外交流”政策，希望私营工商业者为恢复发展生产，繁荣经济而努力。9月28日，又以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名义，发表了《告长沙迁往香港、澳门、广州及西南各地工商界人士书》，具体介绍

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，竭诚希望他们消除顾虑，迅速返长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。2月28日，还组织了有15人参加的《工商界北上参观团》，到北京、天津、沈阳、哈尔滨等城市参观学习。这些措施，对进一步帮助私营工商业者消除疑虑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。一批在建国前夕逃往外地的资本家，先后携带资金和原材料回到了长沙。

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，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两面性，建国以后在政治上仍然有两面性，在经济上也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两面。建国初期，我们在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利用、限制政策的过程中，有过两次大的较量和调整。

（一）打击投机资本，平息涨价风

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，我省先后发生过两次涨价风。1949年11月开始的涨价风主要是受津、沪、汉各地涨价风的影响，领头的行业是花纱、百货、油料，几天之内，一些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成倍地上涨，最高的达500%。第二次涨价风领头的行业主要是粮食。1949年我省遭受特大水灾，加上省垣大部地区尚未解放，城乡交通阻塞，粮食运输受到一定的影响。长沙市的米商、米厂，乘机向四乡抢购，并停机停售，致使粮价剧烈波动。1950年1月，长沙米价暴涨348%，并迅速波及全省。

为了稳定市场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，迅速恢复国民经济，早在1949年8月28日长沙刚刚解放不久，中共湖南省委即发出指示，规定长沙市及其附近各县，从9月1日禁止银元、铜板及其他一切杂钞在市场流通。随后，又颁布《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》及《金银管理暂行办法》等，严禁银元买卖流通，打击金银黑市交易。对各私营银行、钱庄限期办理变业、转业或停业登记。1949年初，长沙市有私营银行32家，钱庄167家，准予登记的银行仅6家（沪汉等地在长的分支行）、钱

庄20家。针对涨价风，省委、省政府又先后发出《关于稳定物价的指示》和《关于加强城市工商管理及城市调剂粮食的决定》，要求打击银元黑市、整顿金融市场，调集大量物资择机抛售；加强市场管理，禁止粮食黑市，1950年2月，长沙市成立粮食议价委员会，2月13日通令全市米商一律将存米进行登记，并自即日起按牌价出售；3月15日，又成立粮食交易所，限令粮食一律到交易所成交，严禁粮商期货辗转、造谣、抬价等不法行为。长沙市军管会贸易处还根据省政府的指示，电邀常德、衡阳、邵阳等地一同大量抛售粮食，致使粮价很快下跌。1950年3月，全国范围内又雷厉风行地实行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，使经济工作更快地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环境。这不仅有利于及时有力地打击投机商，控制市场，而且一举扭转了我国延续十二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。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它的意义“不下于淮海战役”。

（二）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，开展城乡物资之流

1950年全国财经统一后，因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，加上社会心理和供销对象的变化，以及私营企业自身落后等原因，1950年春夏之交，私营工商户关门、歇业的增多。据长沙市不完全统计，1950年3月至5月间，申请歇业的达1千余户。

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，现在工商业的合理调整，是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。调整工商业，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。首先是调整公私工商业的关系，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，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。根据中央指示精神，1950年6月15日，省人民政府发布《贯彻执行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补充指示》，要求各地根据一视同仁，有所不同，分工合作，各得其所的方针，在市场范围、商品价格、加工订货、税收贷款等方面进行调整。各地相继成立改善公私关系委员会、劳资协商辅

导委员会等组织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制定各项调整措施。对私营工业实行委托加工、计划订货和收购产品等办法，以重点维持生产；对私营商业则争取调整价格和限制国营零售范围，扩大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，缩减国营零售品种和零售点，以保证物价稳定和使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有利可得。与此同时，在各基层单位成立劳资协商机构，合理处理劳资矛盾。如长沙市撤销了76个代销点，国营只经营粮食、食油、盐、煤、棉布、石油等主要商品，让出次小商品给私商经营，并在14个行业70多个厂店建立了劳资协商机构。这样，很快扭转了公私关系、劳资关系紧张的局面。到同年8月，长沙、益阳、常德等七市的工商户比1949年底增加62%。

为进一步动员全部商业力量推销土特产，1951年2月，省委、省政府召开全省贸易会议，贯彻中央关于“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，大力推销土特产品”的指示，制定动员公私商业力量共同推销土特产的具体措施，要求各地成立物资交流指导委员会，层层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和土特产展销会。省人民政府还通告各地，废止一切妨碍贸易自由的办法和规定，彻底查惩借故留难采购运销的事件，确保私商经营土特产的积极性。1951年内，省和各地市先后召开各种产销座谈会、物资交流会300多次。通过以上措施，不仅使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，并且有较大的发展。据长沙、衡阳等6市统计，1951年比1950年底资本总额净增率为27%。因此，工商界称之为“难忘的1951年”。

（三）开展“五反”斗争，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

1952年的“五反”运动，是在干部中开展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。因为，三反斗争中的案件大部与工商界有牵连。通过调整公私工商业的关系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得到很大发展，少数资产阶级竟然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进行行贿、偷税漏税、盗骗国家

财产、偷工减料、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“五毒”活动，使不少国家干部受到腐蚀，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损失。我省“三反”运动中，70%以上的案件就与私营工商业者有牵连。

1952年1月28日，省人民政府、长沙市人民政府和省、市政协举行联席会议，号召工商界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诈骗活动。1月30日，长沙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通过了立即在全市开展“五反”运动的决议。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，成立以市委副书记阎子祥为组长的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在统战部办公。紧接着开展运动的有衡阳、湘潭、邵阳、洪江四市，因三反追赃连带搞了“五反”的有常德、益阳、株洲、津市等市。

“五反”运动，是一场激烈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。在运动中，通过广泛发动群众，揭露了资产阶级大量的五毒行为，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。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党仍然是注意组织“五反”统一战线，把批判斗争的锋芒集中在少数完全违法户身上。在定案处理阶段，省委除重申中央规定的工业从轻、商业从重；多数从轻，少数从重；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等原则外，还具体规定长沙市的打击面不超过1%，衡阳市在1%以下，其他各市为0.1%—0.5%。长沙市的“五反”人民法院，除以副市长尚子锦为审判长，工会主席孔安民为副审判长外，还安排了市工商联主任、副市长向德为副审判长，工商联委员邓济美、无党派民主人士张以藩为审判员。为慎重处理违法户的退款补税问题，还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工会及工商联三家联合组成评议委员会，工商户的退款补税如有差错，可向该会申请复查核实。到1952年8月，经评议委员会审查批准，全市私营工商户的退补款由1038万元，核减为664.82万元。到1954年，全省开展过“五反”的地方，又普遍进行了一次复查。长、衡、潭、邵、洪五市最后定案的情况为：守法

和基本守法的为26441户，占参加运动的私营工商业总户数的83.42%；半守法半违法的为5082户，占15.82%；严重违法的211户，占0.656%；完全违法的33户，占0.105%。

（四）再次调整商业，以调动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

“五反”运动期间，私商的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的困难，加上不少工商业者消极对待，私商营业额大幅度下降，由“五反”前占整个市场营业总额的69%下降到50.3%，在短期内失业人员增多。据统计，全省“五反”后共有七万多工人失业。

为帮助私营工商业者克服困难，1952年5月初，长沙、衡阳等市即成立加工订货委员会，并制定《加工订货管理办法》，有计划地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发展。6月8日，省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，要求各地立即结束“五反”，全力转向恢复经济。11月1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》，要求“保持私营商业的一般营业额，不使其下降”。同日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《关于活跃初级市场的六项措施》。为落实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，12月初，省委召开财经工作会议，作出了《关于市场问题的决定》：（1）坚决执行以经济领导市场为主，行政管理为辅的方针，贯彻内地贸易自由的政策，扫除人为障碍，活跃城乡经济；（2）合理调整价格，贯彻国营以批发为主的方针。1953年上半年，全省共召开100多次物资交流会，国营、合作社和私商的营业额，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。

建国后头三年，通过正确贯彻对民族工商业的利用、限制政策，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。到1952年底，全省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.12倍；私营商业零售总额53302万元，比1949年增长了11.11%。它们在为国家增加产品供应，积累资金，扩大商品流通，增加劳动就业，训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同时，我们在利用、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

过程中，对其生产关系逐步实行变业，使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。到1952年底，公私比重有了显著变化。私营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，由1950年的65.1%下降到28.8%；而1952年私营工业总产值中，加工订货、收购包销部分又占48.5%。私营批发额在整个批发额中的比重，由1950年的82.7%下降到43.3%；私营零售额的比重，也由1950年的94.7%下降到68.97%；私营银行、钱庄则基本上被替代。

二、根据我省特点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

（一）组织公私合营企业公司、投资公司，辅导私营批发商转业

解放初期，我们为了掌握货源，控制市场，在一些重要行业建立了专业公司，使粮食、油脂、食盐、百货、花纱布、土特产等业的私营批发商缩小了市场活动范围，有相当多的资金闲散流动在市场上，仅长沙市就有280多万元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购销土特产和兴办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工业却又缺少资金。1951年4月全省土特产交流会上，在研究土特产的产、销、质量、资金等问题时，即提出以公私联营、私私联营，组织公私合营企业公司、投资公司等方式，组织公私力量，促进土特产的销售和生产的发展。省财委并决定立即组建湖南省公私合营企业公司和投资公司。经过数月的协商酝酿，1951年8月5日，我省第一家公私合营湖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。先后吸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28户私营大批发商，号称长沙五金大王的汤永刚，棉纱大王的王颖生，百货大王的林绍安，国贸巨贾张铭西、谭敏学均在其中。共集资128.45万元，占全市1950年工商登记时私营商业资本总额的11.5%；另集散股8万元，政府投资30万。9月1日，公私合营长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，吸收绸布、百货、五金、油盐、花纱、新药等五个行业的33户

私营批发商，共集资75.34万元，另集散股10.38万元。9月5日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，第一期募集公私股金76.1万元，香港的包玉刚、张焕文等也有少量股金在内。其他各市陆续建立的有衡阳企业公司、湘潭建源企业公司、常德汇源企业公司、津市企业公司等。

这些公司成立初期，大都亦工亦商，一方面大力购销土特产，为繁荣市场、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另一方面，通过经营商业，为发展地方工业积累了资金。1953年前后，就陆续转办工业企业。如省企业公司和投资公司，于1952年开始筹建建湘窑业厂（现长沙搪瓷厂前身），敦请香港新城窑业公司经理、高级技术人员肖荫云来长，随后从港来长的还有43人之多，成为建湘窑业厂试制、生产搪瓷、热水瓶厂的骨干技术力量。与此同时，还筹建了建湘制药厂（现湖南制药厂前身），从上海聘请联华制药厂经理张桂华等十名技术人员来厂，1953年底开始生产针剂葡萄糖液、葡萄糖粉及维生素类片剂等十余种药品，结束了我省不能生产上述产品的历史。津市企业公司从1953年起，先后办起了澧东制油厂、新津螺钉厂、澧南粉厂、光明电厂、五三腊纸厂等七个企业，为将津市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轻工业城市奠定了基础。其中的五三腊纸厂，现已发展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卷烟纸厂；澧东制油厂、澧南粉厂则发展成为现在的津市味精厂。湘潭建源企业公司先后办了7家工业企业，其中糖果厂的兴办，结束了湘潭市不能生产糖果的历史。湘潭船舶厂，现已名列我省四大钢船建造厂之首。衡阳企业公司，也先后办了六个工厂。

1953年9月，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，提出有分别地排挤利用批发商后，这类公司在辅导私营批发商转业，引导私营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方面，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。

据长沙、衡阳、常德、邵阳、益阳、洪江、津市等7市统

计，到1953年底，尚有批发商725户。省财委在深入摸底调查，总结前段辅导批发商转业经验的基础上，1954年1月提出对私营批发商的政策是：除对经营统购物资的批发商及棉、百等主要行业的大批发商，依据中央指示坚决挤掉，并予妥善安置外，对中小批发商则按行业进行具体摸底，根据主客观条件，有步骤有准备地前进。对应予排挤的批发商的转业，提出了四点意见：（1）绸布和百货的批发商主要转工业；（2）其他行业的批发商采用投资公司或企业公司的形式，通过商业逐步转工业；（3）资金多、人员少的木材商、进出口商直接转入公私合营的工业、运输业；（4）对无从业人员的游资直接吸收。

长沙市解放初期有私营批发商520家。建国头三年，转入省、市企业公司，转办私营工业，改变经营范围及歇业解散的共计220多户，尚余300来户。为辅导剩下的私营批发商转业，1954年5月，长沙市组建了公私合营湖南建湘企业公司，筹建建湘瓷厂。1954年12月，先将省、市企业公司分出来经营商业的部分转入；后又将药材、南货、五金等14个行业的批发商全部转入，包括部分已转为零售及代批店的批发商；原规划让其继续经营的中小批发商及专业代批店，也一并转入。共计从业人员900人（其中职工710人，资方从业人员280人），资金283.5万元。为吸收更多的流动资金和协助上海解决部分批发商的转业安置问题，1955年吸收该市五金、文具、茶叶等行业的25户商号和一个五金机器厂参加建湘瓷厂，计从业人员266人，资金137.57万元；汉口群力贸易行也合营来长沙，计资金3万，15人。另长沙市还有13人向瓷厂投资7万3千多元。以上四个部分，共计资金346万多元，从业人员1284人，其中资方人员358人。现在建湘瓷厂已是我省大型骨干企业之一，产品远销美国等地。

（二）倡导私私联营、并厂，然后再公私合营，走并小成

二大，以大带小的道路

企业公私合营的作法，是先吃“苹果”，然后吃“葡萄”。即先逐个企业公私合营，然后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。然而我省现代化工业企业甚少，基本上没有像样的“苹果”可吃。以长沙市为例，1950年3月工商登记的工业企业共6565户，其中手工操作的3603户，占54%强。全部工业企业共有资金561万元，户平854元；从业人员29738人，户平4.5人。衡阳市机器业1949年底共139户，其中有动力设备的仅34户，占24.4%，纯手工操作的106户，占75.6%，全业共有资金18万余元，户平1290余元；共有职工1086人，户平7.7人。

以上情况充分说明，我省私营工业是独立劳动者多，手工操作多，资金微薄，经营分散落后。

为适应批量加工订货和生产发展的需要，衡阳、长沙的机器、织染行业早在1950年初就有人提出了私私联营、并厂的主张。如解放后不久，随着铁路修复工程的迅速开展，衡阳铁路局急需大批防爬器、道钉、筑路设备和工具。衡阳市机器业同业公会及时将部分铁工厂和机器厂组织起来，共90余座红炉，成立衡阳市第一联营铁工厂，按时完成了任务。稍后，又将40余户汽车修理厂组织起来，成立衡阳市第一汽车联合修理厂，为部队抢修汽车。到1950年底，长沙市织染行业参加联营的共570户，占全行业总户数的89%以上。为使私私联营、并厂健康发展，1951年4月，长沙市工商局颁布《长沙市私营企业联营组织暂行办法》。1952年，市委、市政府又提出“以大带小，取长补短，技术相近，自愿结合，平等互利”等原则，倡导私私并厂。到1952年7月，长沙市织染（含针织）行业有170户合并为25户。机器业则有90余家小厂并厂合营，组成大众、新中、光华等12家较大的工厂。

这种私私联营并厂，是小型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变化的一

个不可避免的步骤，通过私私并厂，逐步形成一批初具规模的比较现代化的工厂。1954年调查，全省有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共1279户，职工35529人，全部资产2089.77万元，户平27人，资金1633元。100人以上的企业共48户。这些100人以上的企业，基本上是由早几年私私并厂而成。如长沙市织染行业170家合并组成的25家企业，共有从业人员2860人；机器业经私私并厂后组成的12家工厂，100人以上的即有6家。

1953年过渡时总路线公布前，我省先后公私合营了89家工业企业。它们的第一个特点是除少数是因国家有需要而公私合营的以外，多数是因私商有困难，国家投入少量资金加以扶持，或者是将“五反”退补款转为公股而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；第二个特点则是除精一铎品厂、天伦造纸厂、邵阳电厂等少数独家经营的企业是单个企业合营的外，多数是在私私并厂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如1950年4月我省批准的首家公私合营企业——岳南人民机器厂，即是在衡阳市复兴铁工厂、联化翻砂厂等6家企业私私并厂的基础上组成的，公私合营后，又并进了三家私营企业。长沙市针棉织业首家公私合营的中州棉织厂，则是在12家私营企业并厂的基础上组成的。

1954年到1955年，我省又有重点地扩展了45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，基本上也是走的并小成大，以大带小的道路。如解放初，全省登记的私营轮船公司共46户，到1953年经合并改组为10家。1954年3月，批准复华、长湘、民众、湘津四家合并合营，组成公私合营湘江轮船公司，使全省76%的轮船运力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运输计划轨道。1955年春，楚利、民权等余下的6家轮船公司和远东、大东两家修船厂申请合营，9月1日经批准并入湘江轮船公司，创我省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先例。

私营汽车运输业的改造也大体如此。解放初期，全省有私营货车500多辆，1950年组成了36个服务社。1954年成立了公